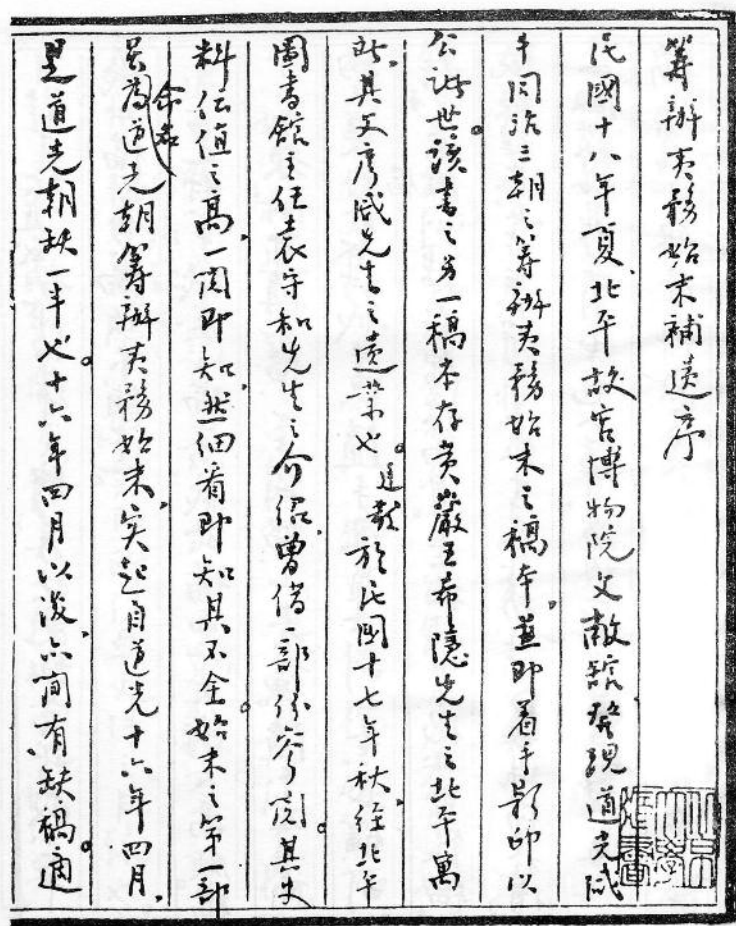


瞭解中西交往的關鍵史料—— 《籌辦夷務始末》的編纂與流佈



蔣廷黻，〈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序〉，《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張志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侯彥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范毅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一、緣起

中國歷史上兩次大規模的中外接觸，第一次當為佛教傳入中國，第二次就是鴉片戰爭後的中西競合。第一次的中外接觸造成佛教中國化，但是第二次接觸後，中國則徹底西方化。短短的一百七十年間，累積三千餘年的中華文化被徹底改頭換面。際此至二十一世紀初，全速西化的勢頭，勁道不減反增。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中西競合，就是近現代中國史的主要內容。

近現代中國史中的最大爭議之一：歐美諸國在中國的所做所為，最終提升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達成與西方共生共榮的目標；抑或是剝削中國自然及社會資源、霸佔廣大市場，以增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簡言之，就是帝國主義論和進步論的辯論。雖然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雙方已略有調和，但是這個命題，迄今尚未塵埃落定。欲以史學研究方法回答此命題，必須尋找史料中的證據，而外文史料中，各國外交檔案和海關檔案向為外國史家入門的關鍵；而中文史料中，就是道光、咸豐和同治朝的《籌辦夷務始末》（統稱《三朝籌辦夷務始末》以下簡稱《三朝始末》）。^①

民國以降，滿清當權者被冠以「腐敗」、「昏庸」、「冥頑不靈」、「閉關自守」等標籤，應對近代中國悲慘遭遇負最大責任。但是詳加考證《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以下簡稱《道光朝始末》）的編纂時間即會發現，當時清廷確有獨到眼光。因為該書自咸豐元年（1851）開始編纂，至咸豐六年（1856）成書。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尚未爆發，咸豐帝仍未遭受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之痛定思痛的打擊，也尚未見證漢人督撫以洋槍洋炮鎮壓太平軍的功效；此時又在太平天國全盛時期，當時清廷即有眼光編纂此書，足為後世借鑑。這項編纂工作至宣統帝遜位才告終，這六十二年間，清廷從不間斷地大量纂輯與「夷務」相關資料。僅由此事即可確定他們並不是昏聩無知，故步自封。

① 茲將《三朝始末》起迄時間與內容概述如下：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以下簡稱《道光朝始末》）：咸豐六年九月（1856.10）由文慶等完成，自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36.6.10）至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1850.1.19），共 80 卷，2,719 件，約 220 萬字。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以下簡稱《咸豐朝始末》）：同治六年四月（1867.5）由賈楨等完成，自道光三十年一月二十三日（1850.3.6）至咸豐十一年六月二日（1861.7.9），共 80 卷，2,988 件，約 200 萬字。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以下簡稱《同治朝始末》）：光緒六年八月（1880.9）由寶鋆等完成，自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8.23）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4.1.12），共 100 卷，3,258 件，約 250 萬字。

《三朝始末》所錄文件並無偏頗，即便文件指出中國官員不是之處，也一併收錄，如《道光朝始末》〈凡例〉中稱：「斷自道光十六年議禁鴉片煙始，訖於道光二十九年英夷不進粵城通商受撫。前後十四年間，凡內閣、軍機大臣所奉諭旨，內外臣工摺奏，下至外國夷書、義民信札，凡有關於夷務者，編年紀月，以次備書。非徒詳往事之是非，實以資異時之考證。書中所載諭旨，諭內閣者十之二三，諭軍機大臣者十之七八，實以軍興之際，沿海用兵，均勞廟算。而一時權宜之計，有未經纂入實錄、聖訓者，悉載此書。」《道光朝始末》之記日體例不同於《起居注》，而仿《實錄》及《聖訓》，雖然原檔標題以數字記日，但是在《三朝始末》中，一律改以干支記日。^②

據清廷官方的記載，《道光朝始末》的編纂始於咸豐帝面諭實錄館總裁官杜受田負責纂輯。杜受田死後由文慶接任實錄館總裁官，繼續編纂《宣宗成皇帝實錄》以及《道光朝始末》。《道光朝始末》編成後「隨同《宣宗成皇帝實錄》進呈，其副本交方略館收藏。」^③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學者張守常在〈《籌辦夷務始末》、《洋務紀事本末》、《總理衙門清檔》〉一文中，對於《道光朝始末》編纂的緣起則有不同的主張，該文中稱：「始發此議（編纂《籌辦夷務始末》）」者，還不是杜受田，而是趙昫。」^④趙昫在其《遂翁自訂年譜》中記載：

實錄體例詳諭旨而略章奏，取要義不取繁辭也。惟夷務之興，方略既無成書，辦理得失全在章奏，備載則累體裁，節去又漏事實，因與杜文正師細商，欲取當時一切陳奏，悉行鈔錄，不遺一字，亦不更一字，匯成一本，名曰《籌辦夷務始末》。進呈乙覽，以備檢查。文正師然之，從容言於上；余因召對，亦詳細指陳，遂奉命交館辦理，至次年鈔成恭進云。^⑤

不論編纂《道光朝始末》之源起是咸豐帝面諭杜受田；或是由趙昫提議，杜受田轉承而咸豐帝許可。在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後，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咸豐帝便極為重視《道光朝始末》，當咸豐十年十一月間（1860.12-1861.1）於熱河行在，即面諭軍機大臣穆蔭，著飭方略館補鈔一份《道光朝始末》進呈熱河。其時受命駐京辦事的恭親王奕訢、軍機大臣文祥於奉旨之後，便即日「督同軍機章京，將《夷務本

② 文慶等主編，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一，〈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凡例〉，頁1-3。

③ 寶鋆等主編，中華書局編輯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第3冊，〈議政王等奏遵旨補繕道光夷務本末完竣進呈摺〉，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5.1.21），頁1319。

④ 張守常，〈《籌辦夷務始末》、《洋務紀事本末》、《總理衙門清檔》〉，《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1981）：218。

⑤ 趙昫編，趙繼元等補編，《遂翁自訂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光緒間刻本影印，1998〕，第155冊），頁23a-23b。

末》底本取到，」經該章京等「捐貲繕寫」、由奕訢等「督飭趕繕，認真校對」。遺憾的是，這一補鈔工作直到咸豐帝死後四年才告竣。恭親王稱：補鈔《道光朝始末》的工作，「現在一律補繕完竣」，「覆加詳閱，尚無錯誤，共計八十卷，謹裝為八十冊，合十六函，恭呈後覽。」「凡涉中外事件，纖悉畢載，最為詳備。」^⑥自此之後，恭親王等又全力編修《咸豐朝始末》，並於同治六年四月（1867.5）纂輯告竣。

同治年間，由於總理衙門的設立，以及洋務的興起，因此在光緒朝時編纂之《同治朝始末》的內容及篇幅則大大擴充。據其〈進書表〉所稱：

伏查辛酉以訖甲戌（咸豐十一年〔1861〕至同治十三年〔1874〕），凡與外夷交涉事務，機宜至蹟，文字彌繁，環海小邦，聞風膺至，而我國內安外攘，所以籌自彊之策者亦備極周詳。歷年恭奉上諭、廷寄，以及京、外臣工之摺奏，各國往來之照會、書函等件，無不臚列於篇，務使秩然有條，足資考鏡。^⑦

《同治朝始末》之後，即為《光緒朝籌辦夷務始末》（以下簡稱《光緒朝始末》）之編纂。雖然宣統年間已初步編成九十九冊《光緒朝始末》，但是卻未曾付梓，以致在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世人均不知有《光緒朝始末》的存在。甚至飽學如徐世昌者也不知此事，並感嘆道：「道咸同三朝籌辦夷務皆有記，分期述事，較有本末，惜降及光宣闕焉不續。」^⑧

史家若需查找光緒、宣統兩朝的涉外史料，通常都利用王彥威和王亮父子編的《清季外交史料》，但是蔣廷黻並不苟同王彥威編輯《清季外交史料》的學術道德。蔣道：

原輯者王彥威先生及新編者王希隱（亮）先生皆係私人，並不代表任何學術或政府機關。那末，私人何能得到若干外交文件？編撰者於已出版的六十冊中，一字不提。若說錄自衙門檔案，政府信用何在？私人道德又何在？以後外國尚敢與我國交換文件嗎？^⑨

蔣在一九三二年尚未閱讀《光緒朝始末》，所以只能提出質疑。五十五年後，馮明珠得地利之便，研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62 冊《光緒朝始末》之原件，進一步確認蔣廷黻在當年的質疑。馮道：「《清季外交史料》前一百八十二卷是本《光緒朝籌辦夷

⑥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中華版），第 3 冊，〈議政王等奏遵旨補繕道光夷務本末完竣進呈摺〉，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頁 1319。

⑦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中華版），第 1 冊，〈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進書表〉，頁 1。

⑧ 徐世昌，〈徐序〉，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 1 冊，頁 1。

⑨ 蔣廷黻，〈外交史及外交史料〉，《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249（1932.10.10）；收錄於蔣廷黻，《蔣廷黻選集》（臺北：文星書店，1965），第 1 冊，頁 122。

務始末記》重輯而成，王彥威隱瞞了這個真相，將官修的成果納於自己的名下。」^⑩但可惜的是，至今尚無人對照《清季外交史料》以及故宮 62 冊《光緒朝始末》殘本，剔除其中重複部分，進而匯整成一部相對完整的《光緒朝始末》。

二、《籌辦夷務始末》對蔣廷黻與費正清的影響

一九三〇年代，大概是研究近代中外交涉史的學者最感振奮的時代，因為《三朝始末》與《清季外交史料》這兩套時間橫跨一八三六年到一九一二年的大部頭史料彙編，都在此時開始複印出版。《三朝始末》之影印甚至被郭廷以譽之為「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⑪《三朝始末》的傳世有兩條脈絡，一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將軍機處檔案移至大高殿存放，一九二七年文獻館開放大高殿收藏供歷史學家閱覽，而《三朝始末》即典藏其中。二則是在典藏在王亮寓中，為王亮之父王彥威所抄的鈔本。而現行於世的《三朝始末》則是影印藏於大高殿中的內務府稿本而成，而非王彥威的鈔本。

關於王彥威和王亮父子之《三朝始末》鈔本，據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之序文稱：

余備員工部，習聞道咸同三朝有欽定籌辦夷務始末記，顧藏之內府無由見也。光緒十二年入直樞省，於從公之暇，展轉尋覓，始於大庫得之，塵封灸積，東西賞度，拂拭排比，乃得完書，惟此編雖經欽定，尚未付刻，因錄副藏之。於是道咸同三朝外交始末瞭如示掌矣。^⑫

換句話說，自王彥威光緒十二年（1886）發現《三朝始末》後，即自己謄抄一份，但是史學家都不知這份資料尚有傳世。或許王彥威擔心謄抄《三朝始末》有干禁令，因此未曾示人。直到民國成立後，王氏父子仍將此鈔本秘藏於府，或許其間曾以之示人，但是至一九二八年才由蔣廷黻開始用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史。

蔣廷黻「於民國十七年秋，經北平圖書館主任袁守和（袁同禮）先生之介紹，曾（向王亮）借一部份參閱。其史料價值之高一閱即知。」^⑬因此，一九三〇年代的歷

⑩ 馮明珠，〈故宮博物院所藏「光緒朝籌辦夷務始末記」述介〉，《故宮學術季刊》5.2（1987）：105。

⑪ 郭廷以，〈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頁1-2。

⑫ 王彥威，〈自序〉，《清季外交史料》第1冊，頁8。

⑬ 蔣廷黻，〈序〉，蔣廷黻編，《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第2冊，頁1。

史學家中，對《三朝始末》用力最深，研究最精的就是蔣廷黻，一方面因為蔣專精外交史，另一方面是因為蔣在文獻館尚未開放《三朝始末》時，就已接觸過該批史料。而一位剛從英國前往中國的美國青年學者，也因蔣對《三朝始末》的研究，開創了他的近現代中國史的視野，這位就是未來大名鼎鼎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¹⁴

透過費正清指導教授 Charles Kingsley Webster（1886-1961）的介紹，費拜訪了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蔣廷黻。「與蔣廷黻的關係，使費正清獲得了許多直接的幫助。蔣廷黻刻意照拂費正清，對其研究構想深感興趣，並且提供了適當的幫助。」¹⁵然而，真正開拓費正清對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視野，就是在蔣廷黻的引導下，費正清開始接觸了《三朝始末》。在蔣廷黻的指導下，鑽研《籌辦夷務始末》的歷練，奠定了費正清研究近代中國掌握中文文獻的能力。在費正清離開中國的二十個年頭之後，他「仍然鑽研這些文獻，並教導研究班學生如何使用」。¹⁶當何炳棣於一九五三年以後學之姿，在哈佛大學遇到費正清時，「極度誠懇地恭維他是蔣廷黻之後，與世第二位學者研究引用《籌辦夷務始末》」。¹⁷由此可見，蔣可說是引導費利用《三朝始末》深入研究近現代中國史的啓蒙者。

費正清如何從蔣廷黻學習利用《三朝始末》？這可從蔣整理《三朝始末》的三方面開始分析：一曰：「利用」；二曰：「補遺」；三曰：「新編」。而此三面之代表作品即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籌辦夷務始末補遺》（以下稱《始末補遺》）、及《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兩卷。費承襲了蔣的史料編纂路線，於哈佛大學也進行了類似的工作，細節將在下節分析，本節先討論蔣在《三朝始末》下的功夫。

先就蔣「利用」《三朝始末》史料，分析其研究成果。蔣在〈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一文中，評價《道光朝始末》的史料價值時說：「在故宮博物院發刊籌辦夷務始末以前，除外交部的各朝條約以外，我國政府並無有系統的外交文件發表。私人的文集中有關外交的雖然不少，但都太零碎。」¹⁸另一方面，蔣廷黻深諳英文，深悉晚清涉外的中文奏摺文件已被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¹⁴ 蔣廷黻在其回憶錄中，完全沒有提到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期，費正清與他的交往。所以本文中，蔣費之間的友誼，僅可從費的回憶錄中得知。蔣在清華時間，請見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頁121-133。

¹⁵ 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p. 26.

¹⁶ 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 86.（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頁98）。

¹⁷ 費馬上糾正何道：「是第三人，張德昌早我半年」。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頁298。

¹⁸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週刊》37.9/10（1932）：999。

上，以便國外學者研究；然而，經其檢視《道光朝始末》後，發現多數英譯文件之原本均可在《道光朝始末》中見到，故蔣主張「假設現在所出版的夷務始末能把它譯成英文或法文，那麼對西方學者的價值，或竟比已往原文對中國學者的價值還大一些。」¹⁹

西方學者，尤其是外交史家（如費正清的指導教授 Webster），在研究中國對外關係時，只能接觸外國外交史料或是海關史料，所以他們對近代中國外交史的理解，常被史料的視野限制。蔣廷黻深悉此弊，故瞭解對 Webster 和費正清而言，《三朝始末》等於是歐美外交史料的對照組，呈現了迥然不同於西力東漸的史觀，而是中國奮鬥的歷程。但是一九三〇年代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史家，通常中文造詣不足以應付無句讀的文言文史料，所以翻譯成英文或法文就變成西方史家的當務之急。對一九三〇年代的費正清而言，日後能否成爲一個大家，尚有待他可熟練地使用中文，以掌握《三朝始末》的史料，以及史料中蘊藏的史觀。日後，費也承襲了蔣的主張，將部份《三朝始末》的史料譯成英文。

雖然蔣廷黻對《道光朝始末》的史料價值有如此高的評價，但他也對其編輯方法提出批評：

編輯不按文件內容的事實，專憑文件的年月日。此法雖過於機械，但其長處實亦不少……但《夷務始末》的文件的年月日並不全備；軍機處所發的「廷寄」僅有北京頒發的年月日，而沒有地方官吏收到的年月日；奏摺僅載有奉硃批的年月日，而沒有地方官吏拜發的年月日；照會皆成爲奏摺的附件，而沒有原發及原收的年月日。這樣一來給研究者無窮的困難。《夷務始末》原書繕寫甚精，故宮博物院爲避免抄寫及排印錯誤起見，就把原書影印出來了。²⁰

雖然〈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似爲分析史料，但內容十之八九爲利用《道光朝始末》重新研究林則徐、琦善和耆英在鴉片戰爭時的角色及政策。²¹對於林則徐民族英雄的角色，蔣也提出嶄新的看法：「他（林則徐）不曾明瞭英國政府與鴉片煙的重要財政關係。更可惜的是他完全錯看了對方的戰鬥實力。他想英國人一到陸地就好比魚之離水。」²²同時蔣也對琦善的綏靖策略提出辯護：「琦善觀察事物獨具隻眼，第一，他看透了中國決不能與英敵。由此乃著手爲和平努力，自與義律及懿律接見起，他就雙管齊下：一方面他用最生動的筆法爲皇帝描寫英國礮船之利，一方

¹⁹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999。

²⁰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997。

²¹ 其他蔣廷黻重新研究鴉片戰爭的文章，請見蔣廷黻，〈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清華學報》9.4（1934）：783-828；收錄於蔣廷黻，《蔣廷黻選集》第3冊，頁 519-568。

²²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1001。

面他想用外交手腕籠絡英人，換句話說，就是同他們『講理』。」²³該文結論洞悉當時滿漢大臣間的政策差異：

林則徐、徐廣縉、葉名琛是傳統思想的繼承者，結果造成了 1860 年的大禍，而琦善、伊里布及耆英是另外一派，或可稱為改進主義（唱低調）的擁護者。當時附和傳統主義（唱高調）的都是漢人，附和改進主義（唱低調）的都是滿人。²⁴

中文語境中的「傳統主義」和「改進主義」似乎沒有高低之分，但是蔣氏深諳英文，當譯成 Conservatism 和 Reformism 後，就可見在蔣氏心中對兩批人馬的評價。其言外之義明白揭示：導致鴉片戰爭的原兇不是懦弱無主見的滿人，而是拘泥固執的漢人。這些不利於林則徐的資料，解構了林則徐作為「民族英雄」的神話，更進一步詮釋了琦善之顧全大局的大度和耆英不得不然的無奈，但是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飽受日本侵略者威脅，中國知識份子無法接受蔣廷黻這種心平氣和、就事論事的言論。

由〈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的史觀脈絡可知，蔣認為中國並非僅為「被動的受害者」，²⁵蔣曾論：「帝國主義或者殖民主義的受害者用自己的力量來轉變這種局面，扭轉這種過程，至少能達到用平等、互惠的關係來代替受帝國主義支配。」²⁶五十年後，費在其回憶錄中，仍然高度評價蔣的心平氣和、就事論事的研究態度：

蔣廷黻創立了一套課程，即開設有關於亞洲主要地區講座，並包括舉辦研究生專題討論培訓班。像 Charles Webster 一樣，他把歷史知識看作國際間外交與和平的陪襯。他渴求建立中國一邊的檔案，務必要超過馬士博士的「藍皮書歷史」（因為英國 Foreign Office 檔案向以藍色書皮裝訂，故在 1930 年代把英國 FO 檔案統稱為藍皮書），因為馬士的著作主要根據英國原始資料作為唯一可供使用的資料。當他發現清政府在 1842 年對英國人是何等人，英國人究竟想幹什麼等問題是多麼無知時，他感到震驚。……他撰寫英文投寄英美雜誌，論證這些新發現的中國文件能夠提供什麼。²⁷

²³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1001。

²⁴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1005。

²⁵ 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p. 27.（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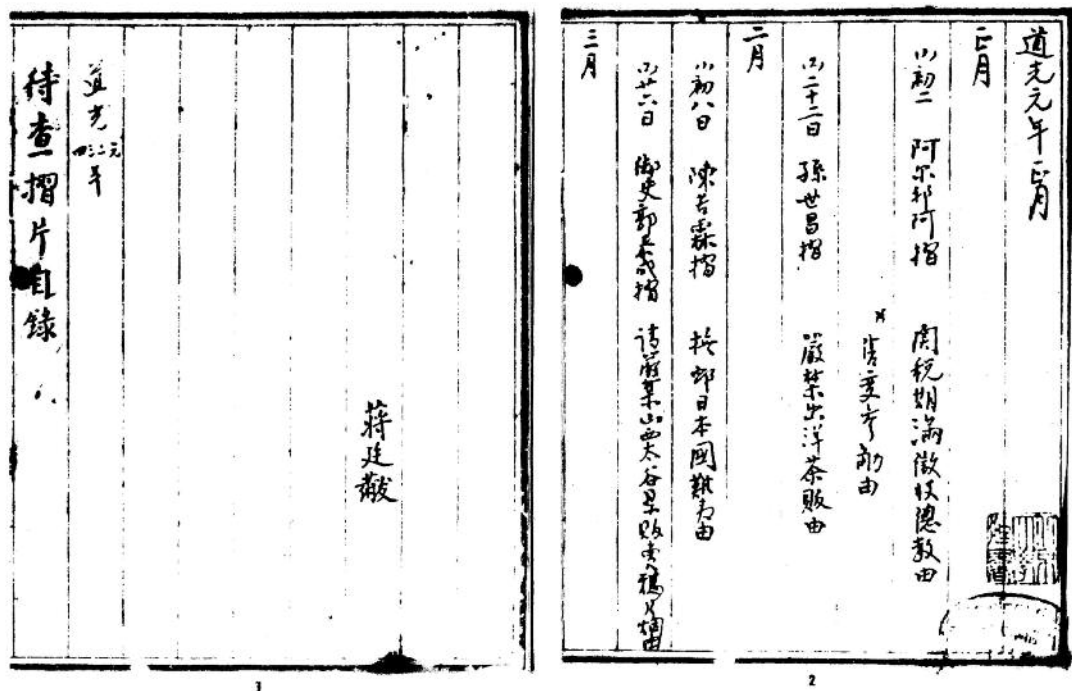
²⁶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p. 27.（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頁 25）。

²⁷ Fairbank, *Chinabound*, p. 88.（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頁 100-101）。

再者，就蔣廷黻的「補遺」《三朝始末》之功加以分析。蔣於閱讀藏於王亮府中的《道光朝始末》後發現，《道光朝始末》乃始自道光十六年四月，換言之道光朝之涉外史料乃缺上一半，所以蔣於一九二九年秋應清華大學歷史系之聘後，「決就故宮所藏之軍機處檔案編《始末補遺》。」蔣於《始末補遺》序文中概述其編錄之手續：

廷黻首閱隨手檔。遇有奏章及上諭有關外交尚不見於始末者即隨手檔抄錄一「外交隨手檔」（見圖一），實即（《始末補遺》）所須要文件之目錄也。目錄交於文獻館之職員，請其入庫檢查。所須要文件檢出後，付抄寫者寫。廷黻從民國18秋至20秋，每星期在大高殿工作1日，上午先看隨手檔，編所要文件之目錄。然後校對抄寫者之抄本。校對時，抄寫者誦讀原文，廷黻則閱其抄本。²⁸

《始末補遺》中2,006件原檔補足《三朝始末》中的缺憾。由道光元年一月二日（1821.2.4）始至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1865.8.10）。根據筆者建立的《始末補遺》電子目錄統計得知，道光朝原檔共計1,052件，咸豐朝共529件，同治朝共425件。其中與海關及常關相關者共計478件，與鴉片相關者共187件。文件集中在教案、海關、貿易、鑄錢等事由，彌補了《三朝始末》中欠缺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史料。



圖一：蔣廷黻手抄目錄

²⁸ 蔣廷黻，〈序〉，蔣廷黻編，《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第2冊，頁2-4。

當蔣於大高殿抄錄《三朝始末》「隨手檔」時，費正清也在大高殿協助整理。蔣、費兩人又相互交換《始末補遺》及由馬士（Hosea Ballou Morse）贈與費正清的海關資料。但因九一八事變，軍機處檔案從北平運往南方，於是蔣被迫中止《始末補遺》的編輯工作，日後又因抗戰爆發，清華大華圖書館被日軍擊燬，藏於該處的《始末補遺》稿本與費氏贈與清華大學的海關檔案一併失蹤。然而令人感到驚喜的是，《始末補遺》多年以後竟被發現尚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完好無恙，隨後於一九八八年由大陸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相關細節將在下節詳述。

第三，就蔣氏於「新編」史料之功加以分析。蔣爲了重新審視近代中外交涉史，從而編輯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兩卷。其中自《三朝始末》選錄出來的檔案即加了英文人名、標點符號、陽曆日期及硃批附註。在上卷序文中其自言：

原料不盡可信；次料非盡不可信。……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關於中國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這個毛病。西人姑不置論，中國學者所寫的中國外交史有幾部不是以英國藍皮書爲主要資料呢？我編這書的動機不在說明外國如何欺壓中國，不平等條約如何應該廢除。²⁹

蔣以「擇其信」、「擇其要」及「擇其新」的角度，主張「歷史化中國外交史，學術化中國外交史」，³⁰到了中卷付梓時，蔣氏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視野更加明朗，延續了〈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的脈絡，爲晚清滿漢諸臣，對於扭轉局面下的功夫做出辯護，中卷序文中道：

前人的世界知識固極有限，但他們得世界知識的機會亦極有限。無論如何「昏庸」兩字不能做他們的頭銜……他們的外交誠有可批評之處；這書內各章節的引論可以證明我不是盲目崇拜的，不過我們要記得，這些人實配做我們文化的代表，我們批評他們就是批評我們的文化，他們的失敗就是我們文化的失敗。³¹

蔣在一九三五年離開了學術界，他對於《三朝始末》的三項整理工作也只好暫告停止，但是他在〈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中的史識、整理《始末補遺》中的史才、以及編輯《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的研究方法，則被他早期所指導的美國學生費正清延續下去。透過費正清，蔣氏更進一步影響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臺灣整理出版史料彙編的工作。

²⁹ 蔣廷黻編纂，《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卷上，頁1。

³⁰ 蔣廷黻，〈序〉，收入蔣廷黻編纂，《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卷上，頁2。

³¹ 蔣廷黻，〈序〉，收入蔣廷黻編纂，《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卷中，頁2-3。

研究費正清的 Paul Evans 在評價蔣、費兩人的交往時，說道：「雖然費正清效法蔣廷黻，他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的地位還遠比不上蔣氏所具有的權威性。」³²可惜的是，蔣在一九三五年離開了學術界，使得在孜孜於學的費正清在日後超越了蔣在近現代中國史研究中的地位。且不論蔣、費兩人日後在政治立場上的歧異，費從未忘記蔣對他的啓蒙，當費於一九七二年接受周恩來邀請到北京訪問時，他向 90 名外交部的聽眾發表演說，開頭說道：「如果我不表彰在 40 年前在清華大學師從蔣廷黻時，他的恩德和栽培，我無法開始我的演講……我的開場白雖然有歌功頌德的味道……但是我估計對聽眾而言，你們的身爲中國人遠比身爲共產黨員重要，所以我應該這麼做。」³³

費正清的論文結果以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一書出版，成爲西方研究近代中國的開山之作，爾後，鄧嗣禹與費正清合編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形成其日後影響學界深遠的近代中國「西力沖擊回應論」。而追本溯源，費對近現代中國史的理解，其實皆源自於蔣對帝國主義在華影響以及中國扭轉局面的力量的交互研究。蔣的史觀輔以《三朝始末》的史料成爲費在哈佛大學，開創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基礎。

三、費正清、近史所與近現代中國史料的彙編工作

透過蔣廷黻的指點，費正清瞭解了《三朝始末》的重要性。但是真正引起歐美學術界重視中文原始資料的契機，則是非常務實的理由：美國想要瞭解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工業發展，所以必須先瞭解十九世紀的中國工業發展。在此務實動機的驅使下，太平洋關係協會秘書長 William L. Holl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向洛克斐勒基金會人文部 (Humanities Divisi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爭取經費後，委託費正清與鄧嗣禹 (Ssu-yü Teng) 合編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954)，³⁴ 其中挑選了 65 件跨越一八三九至一九二三年的第一手中文資料並翻譯成英文。費正清挑選的資料在內容層面上，超越了《三朝始末》及蔣廷黻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因爲內容涵蓋了當時的思想、文化及社經觀察等史料。

³²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p. 50. (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頁 54)。陳同之譯文已被譯者調整。

³³ Fairbank, *Chinabound*, p. 91. (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頁 104)。陸惠勤譯文已被作者調整。

³⁴ Acknowledge; Ssu-yü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但外交檔案還是費正清的主要著眼點。《三朝始末》搜集一八三九至一八七六年的外交史料，費正清就從其中挑選出 10 件，其他的文件則是從時人文集中挑出。深究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編纂體例，由下圖（圖二）即可得知其與《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圖三）十分類似，兩人都將史料編年排列，將各章定為不同主題，各章下的各節都有引言，簡介時代背景和問題意識。

CONTENTS	
Reigns of the Ch'ing (Manchu) Dynasty	viii
PART ONE. THE PROBLEM AND ITS BACKGROUND	
Chapter I. Introduction	1
Chapter II. Some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6
a. <i>Some Early Ch'ing "Nationalist" Thinkers</i>	7
b. <i>The Early Jesuit Influence in China</i>	12
c. <i>The Attitude of the Ch'ing Court toward the Westerners</i>	17
PART TWO. RECOGNITION OF CHINA'S NEED TO KNOW THE WEST, 1839-1860	
Chapter III. Commissioner Lin's Program for Meeting British Aggression	23
Doc. 1. Lin Tse-hsü's Moral Advice to Queen Victoria, 1839	24
Doc. 2. A Letter of Lin Tse-hsü Recognizing Western Military Superiority, 1842	28
Doc. 3. Wei Yuan's Statement of a Policy for Maritime Defense, 1842	30
Doc. 4. Cantonese Denunciation of the British, 1841	36
Chapter IV. The Policy of Conciliation	36
Doc. 5. Ch'i-ying's Method for Handling the Barbarians, 1844	37
Doc. 6. Hsü Chi-yü's Acceptance of Western Geography, 1848	42
Chapter V. The Emergence of the Theory of Self-Strengthening	46
a. <i>Prince Kung and the Tsungli Yamen</i>	47
Doc. 7. The New Foreign Policy of January 1861	47
b. <i>Feng Kuei-fen and his Essays</i>	50
Doc. 8. On the Adop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51
Doc. 9. On the Manufacture of Foreign Weapons	52
Doc. 10. On the Better Control of the Barbarians	54
c. <i>The Taiping Rebels' Interest in Modernization</i>	55
Doc. 11. Hung Jen-kan's Proposals, 1859	57
PART THREE. THE DESIRE FOR WESTERN TECHNOLOGY, 1861-1870	
Chapter VI. Tseng Kuo-fan's Attitude toward Westerners and their Machinery	61
Doc. 12. Excerpts from Tseng's Letters, 1862	63

圖二：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目錄

但是由外國人檢閱文言文的原始史料畢竟太過艱澀，所以必須培養以中文為母語的史學人才。因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韋慕庭（C. Martin Wilbur）與費正清也助了一臂之力，成功地向福特基金會爭取到一筆款項。³⁵所以近史所草創時期的研究人員即直接參與了《三朝始末》的編纂工作。由於《三朝始末》卷帙浩繁，首要工作就是建立詳盡的索引。其實編輯《三朝始末》索引之編輯工作也始於一九三〇年代。而這項工作的倡始者就是哈佛燕京學社的洪業（William Hung），這項工作後來由他的美國學生饒大衛（David Nelson Rowe）帶回美國後發揚光大，饒大衛在〈序言〉中交待了編輯索引工作的艱辛，他道：

如此浩大的工作絕非一人之力可完成。在1938年，我還在北京讀書，受業於哈佛燕京學社的洪業教授時，就著手進行這項工作，……我在1938年返美，當時洪教授門下還有幾名編輯者繼續進行這項工作，之後約有一萬七千張條目卡片寄到普林斯頓大學給我。

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	
目錄	
第一章 鴉片戰爭	一
第一節 戰前中外通商及邦交之衝突	一
第二節 煙禁之加厲	二三
第三節 林則徐時期之鴉片戰爭	五二
第四節 琦善時期之鴉片戰爭	八二
第五節 南京城下之盟	一二
第二章 伊里布耆英之撫綏政策	一一〇
第一節 中英商約	一二〇
第二節 中美商約	一三八
第三節 中法商約	一三五
第四節 鼓浪嶼及舟山之收復	一四一

圖三：《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目錄

雖然我在美國四處張羅經費，想要完成這項未竟之業，但是終究徒勞無功。重啓這項工作的契機則是在1954年我回到了中華民國（臺灣），當時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教授即著手進行我帶來的資料，再由近史所楊紹震教授帶領一批研究助理再度開始這項工作……由於這項工作是集合眾人之力而成，當初（1938年）的索引卡片被大幅修正，最終成書時，索引卡片有一萬五千至一萬七千張。³⁶

³⁵ 見陳三井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與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³⁶ David Rowe ed., *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c1960), x-xi.

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到一九六〇年結束，這二十二年的編輯成果就是：《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索引》（以下簡稱《始末索引》）（*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始末索引》之困難，由饒大衛都不清楚索引卡片究竟有幾張即可得知。洪業之於饒大衛與蔣廷黻之於費正清似乎體現了相同的脈絡：蔣廷黻與洪業都在一九三〇年代開始《三朝始末》問世後，馬上發現該批史料的重要性，因此指導後進著手整理，唯一不同之處為，蔣對《三朝始末》進行「利用」、「補遺」、「新編」的工作，而洪業則開始索引編輯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前，蔣、洪兩位奠定的基礎，被他們的美國學生帶到了美國；但到一九四九年後，這種堅實的訓練反而由當年的美國學生帶回臺灣。費正清與饒大衛開始與臺灣的中國學者合作，楊紹震帶領的研究助理，如李國祁、呂實強和王爾敏，後來都成為臺灣近現代中國史學界赫赫有名的學者。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國史學界的學術訓練，反而先傳至美國，再由美國傳至臺灣，這完全體現為何《三朝始末》開啓了中西學術交流的契機。（圖四）

《始末索引》之繁重不僅僅在於 15,000 至 17,000 項條目，而是在於其條目分門別類之翔實和卷頁行數之精確。由下圖（圖四.3）可知在索引中清楚標明何為人名、職名、地名或物名以及人名之國籍。除標明卷數和頁碼之外，也標明行數。除此之外，連「省」、「銀兩」或「英國」這類不會出現在一般索引上的普通名詞，也被納入該書，且「領事」、「使臣」之類索引都分別國籍，所以時至今日仍是最完全的索引。

為了體現《始末索引》中分門別類之翔實和卷頁行數之精確，以下舉例說明：琦善 CH'I SHAN: N(MA) tk 2/28a2，N 代表人名、MA 代表滿族、tk 代表《道光朝始末》的威妥瑪式拼音、2 代表《道光朝始末》第二卷、28 代表該卷第 28 頁、a 代表正面、2 代表第 2 行。由圖五即可得知，用此體例尋找人事物極為便利，自此以後，歐美史家引用《三朝始末》時，都沿用饒大衛的索引體例。

費正清從未忘懷《三朝始末》的重要性，他始終「致力於研讀《三朝始末》，並指導他的研究生如何一窺堂奧。」³⁷ 費正清的得意門生 Mary Wright，在熟諳《三朝始末》後，即以《同治朝始末》的史料知識為基礎，寫出了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這本書可說是為晚清政權的第一本翻案專著，給予晚清的近現代改革相當高的評價。Wright 總結道：「雖然《夷務始末》記載著中國在處理外國事務時，一再重申的推托之詞，但是也記錄著更為重要的資料：『勞心勞力、歷經挫折後推敲出的現代外交政策』。雖然中國在時勢逼迫下，

³⁷ Fairbank, *Chinabound*, p. 86.

INTRODUCTION

This 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 hereafter to be referred to by the initial letters of the last four characters in its transliterated title, namely IWSM, has been planned to include as many categories of items as has been thought feasible. The chief categories are as follows. They are listed alphabetically and without any implication as to relative importance:

1. Geographical features.
2. Insignia of rank or identification.
3.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4. Items of trade.
5. Items of exchange.
6. Official titles.
7. Personal names.
8. Place names.
9. Religious titles and terms.
10. Ships and hulks.
11. Tax categories.
12. Tribal names.
13. Weapons and fortifications.
14. Miscellaneous.

I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nly those official titles which are accompanied by names of geographical localities or by personal names are indexed. In Imperial central government, only those titles which are accompanied by the Imperial agencies or by the personal names are indexed. All other titles, informally or casually referred to or abbreviated, are not indexed.

Official titles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are indexed in separation with their geographical names. For example, Liang Kuang Tsung Tu (兩廣總督 Viceroy of Two Kuangs) is divided into Liang Kuang, the geographical name and Tsung Tu, the official title. Ning-Shao-T'ai Tao (甯紹台道) is divided and indexed into Ning Po (甯波), Shao Hsing (紹興), T'ai Chou (台州), the geographical names, and Tao T'ai (道台), the official title or title of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The official titles of Imperial central government are indexed together with their Imperial agencies. For example, Li Pu Tso Shih Lang (禮部左侍郎 Vice-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Rites) is indexed as one single title.

Identifications are attempted wherever possible. For several of the categories listed above, abbreviations are used as follows:

- N stands for a personal name
- O stands for an official title
- P stands for a place name
- T stands for an item of trade.

In identifying persons and places,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are used to designate various nations, tribes, religious groups, races, etc.:

圖四.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索引》(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 體例說明

(A)	American
(AN)	Annamese
(AU)	Austrian
(BEL)	Belgian
(Burut)	Burut-Kazak
(C)	Chinese
(DEN)	Danish
(E)	English
(F)	French
(FOR)	Unidentified non-Chinese
(G)	German
(HA)	Ha-sa-k'o equals Kazak
(HO)	Dutch
(I)	Italian
(J)	Japanese
(K)	Korean
(MA)	Manchu
(MO)	Mongolian
(Nepal.)	Nepalese
(NOR)	Norwegian
(P)	Prussian
(PE)	Peruvian
(POR)	Portugese
(R)	Russian
(RY)	Ryukyuan
(SP)	Spanish
(SW)	Swedish

All entries in this Index are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according to their transliteration by the Wade-Giles system. The alphabetical ordering of items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is based upon the Wade-Giles transliteration of entire items. Under each entry, references to the text of the IWSM are arranged by reign period.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are employed throughout the Index:

tk	indicates <u>Tao Kuang</u> reign period, 1836-1850 in IWSM
hf	indicates <u>Hsien Feng</u> reign period, 1851-1861
tc	indicates <u>T'ung Chih</u> reign period, 1862-1874

Under each reign period items are listed by book or chüan number, page number obverse (a) or reverse (b), and line or column number. Thus an item in Hsien Feng reign period, chüan number 12, page 10 obverse, line six, would be listed as follows: hf 12/10a6.

For those unfamiliar with the Wade-Giles transliteration, a finding index is provided (pages 823-55). This index lists all single-character entries and the first characters of all multiple-character entries. These are arranged by stroke count according to the K'ang Hsi Dictionary. Sub-arrangement is by radical number according to the K'ang Hsi Dictionary, and within that by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 transliteration according to Wade-Giles. References are to the pages of the main Index where the character first appears.

I have listed on the title page the names of those who did the main work of editing and compiling this Index. A task as large as this could never be the work of a single person. It was begun in 1938 when, while studying in Peking under a Foundation fellowship, I first came under the guidance and tutelage of Professor William Hung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hen on the faculty of History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now of Harvard University. At his suggestion, the work of compilation was first begun by the late Ch'eng-sun Chang, then a student a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who was to lose his life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1937-

圖四.2：《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索引》(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 體例說明

A

阿(副領事) A (FU LING SHIH) : N(E)
tc 30/33b1, 34a5, 36a10, 37b8

阿(領事) A (LING SHIH) : N(E)
tc 65/30a8, 31a6, 31a9

阿彰阿 A CHANG A : N(MA)
tk 21/17b2

阿查理 A CH'A LI : N(E)
tc 4/44a8; 6/11a5; 7/39a5,
41a10, 41b10; 8/46a10;
12/7a2; 27/14b4; 30/36a10
hf 41/27a8, 28a4

阿昌阿 A CH'ANG A : N(MA)
hf 76/6b4; 77/25b6
tc 3/24a4, 25b7

阿城鎮 A CH'ÊNG CHÊN : P
tc 33/11b9, 20b9

阿吉 A CHI : N(MA)
tc 10/55a4, 55b2, 55b3;
15/ 51a8; 16/22b10; 17/6a2,
27a2, 27a5; 19/35a9; 21/31a7;
22/33a3; 23/15b5; 24/7b5,
7b6, 13b1; 26/14b4, 14b6,
15b3; 28/9b9, 10a6, 10a7,
12a2; 29/27a3; 32/28a4, 28b9;
44/28b4; 88/28b10

阿濟 A CHI : N(MA)
See A CHI 阿吉

阿濟臺 A CHI T'AI : tribe
tc 14/28b1

阿奇夏 A CH'I HSIA : P
See A CH'I HSIA NA

阿奇夏納 A CH'I HSIA NA : P
tc 11/19b2; 18/7a10; 19/19b7,
21b8; 20/27a2; 22/1a3, 1a7,
2b9; 25/13a9, 15a2, 17a6

阿金 A CHIN : N(E)
tk 57/31a

阿精阿 A CHING A : N(MA)
tk 20/33a4; 22/4b9, 5a7, 6b8,
7a3, 7a4, 18a5, 18b2, 18b5;

阿精阿 A CHING A (cont.)
23/4b7, 6b1, 6b3; 24/2a4,
2b8, 8a1, 8a4, 10b7, 10b8,
12a8, 12b2, 9a7, 20b8,
24a8, 24b1, 25b5; 25/17b5,
18a3, 19b6, 20b10, 26a2;
26/18a8, 20b10, 21a4, 22b7;
28/25b6, 32b1, 33a8; 29/3a2,
9a1, 11b5

阿爾察爾 A ÊRH CH'A ÊRH : P
tc 44/14b10

阿爾胡特 A ÊRH HU T'Ê (HO) : river
(河) tc 9/44b1; 16/23b2, 23b4

阿爾噶依 A ÊRH KA I T'U : P
圖 hf 11/21a3; 14/7b7; 15/19a6;
16/2a9

阿爾該國 A ÊRH KAI KUO CHA T'U MAN :
扎圖滿 P
hf 11/24a3

阿爾葛塔 A ÊRH KO TA : P
tc 27/1b4

阿爾管 A ÊRH KUAN : river
hf 18/32b6, 33a10; 19/3b3;
39/31a10

阿爾袞河 A ÊRH KUN HO : river
See A ÊRH KUAN

阿爾瑪圖 A ÊRH MA T'U : P
See A LO MA T'U

阿爾明雅 A ÊRH MING YUNG : N (I)
Captain Vittorio Arminjon
tc 44/23b5, 23b9, 24b5, 35a,
36a3, 36a4, 36b3, 37b8;
45/30b4, 30b8, 31a9;
46/10b5; 50/37b9, 37b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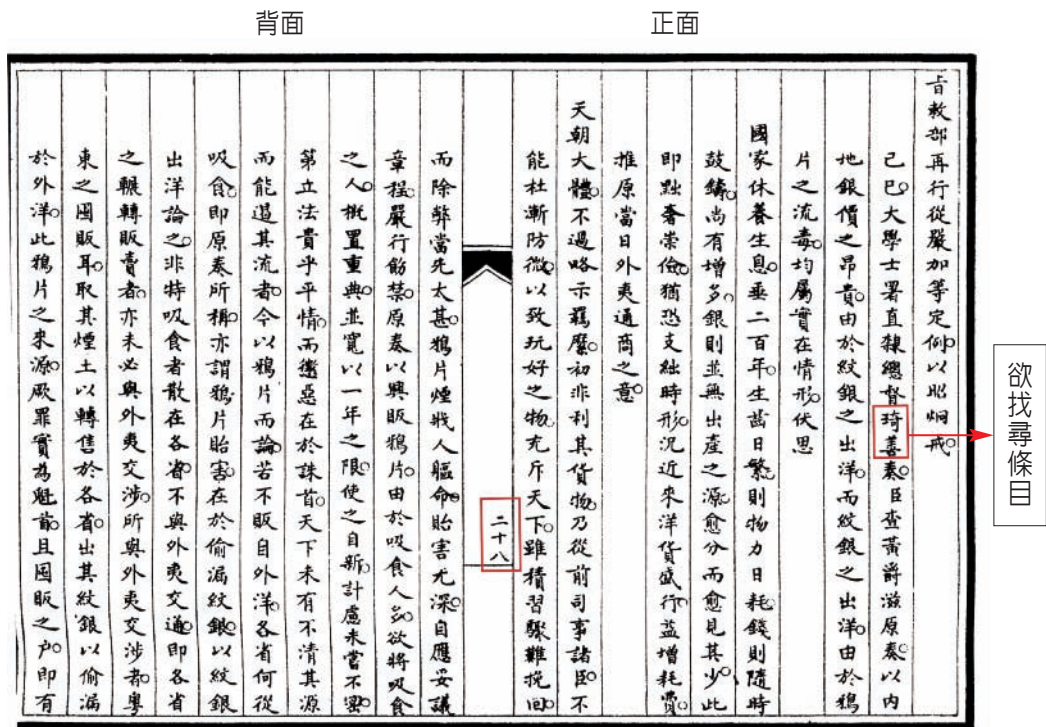
阿爾邦阿 A ÊRH PANG A : N(MA)
tk 1/8b7

阿爾琿鎧 A ÊRH PÊNG K'AI : N(MA)
tk 14/25b4

阿爾達 A ÊRH TA : N(POR)
Jose Maria Ponte e Horta
tc 58/31b5

阿爾塔什 A ÊRH T'A SHIH TA : N(MO)
達 tc 3/3b6, 6b1, 23b6; 5/25b10;
27/5a4; 40/6b1, 6b5; 58/3b7;
60/6b6; 62/26a10; 75/34a4;
79/3b3

圖四.3 :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索引》(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 內文



圖五：《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二，頁28。

制定的外交政策大原則是文明的（civil），但是中國長期戰略，仍以發展軍事力量做為重點國策。」³⁸ 這句話道盡了晚清自強運動重臣們，一方面以外交斡旋爭取時間，另一方面努力追求軍事現代化時的高瞻遠矚與無可奈何之情。

當美國學者全力整理《三朝始末》的中外關係檔案時，近史所別闢蹊徑開始整理總理衙門的涉外檔案。由於總理衙門專責處理中外交涉事務，其檔案分類更為精細。軍機處之中外檔案僅以時間排序分類，但是總理衙門檔案則是以檔案內容、國別及事宜加以分類。而專司其職的就是一八六四年開始專設的總理衙門清檔房。據恭親王稱：

今議專設清檔房，所有修檔一事，專於新傳到署人員中，派出管理，暫不令其管理各股。緣新到人員一切生疏，一令辦事，則無暇細看檔案，於各事始終本末，難期貫通。今令專管修檔，藉此翻閱，日久諳熟，下筆自可了徹，於學習實有裨益。另於總辦、督辦中，特派二員，充該處提調，以資稽考……所有專寫清檔供事，即歸該司員等稽察考核。另傳蘇拉四名，裨供差遣。併請嗣後清檔專辦正本，不辦草本。其清檔目錄，由承修各員隨案纂入，仍將承修官、校對官名姓列於卷首，各行畫押。每逢一季，由各該員將所修清檔分股呈堂閱看：

³⁸ Mary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248-249.

如所纂之案，內有遺漏，惟承修司員是問；錯字過多，惟校對司員是問。³⁹

在總理衙門保存的許多清檔當中，有不少已為近史所出版，其中郭廷以主編的《四國新檔》即是其中一部。在編纂該書的過程中，郭廷以將該份資料與《籌辦夷務始末》做了詳細的核對，結果發現在該書所收錄的 3,403 件當中，有 1,307 件完全與《籌辦夷務始末》中的文件重複，279 件是「稍有出入（文字僅有一、二句之出入）」，435 件是「有出入（文字成行成段之出入，或雖祇一字一句之異，但與史實關係重大者）」，而最後的 1,382 件則是《三朝始末》所未收錄的。⁴⁰若非郭廷以非常重視《三朝始末》，否則很難理解為何他要花費如此多的精力去做比對軍機處與總理衙門涉外檔案間的異同。

完成《始末索引》與《四國新檔》後，近史所也開始仿照費正清編纂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的模式，著手編纂由中國觀點出發的近代中國史料匯編。一九五九年，郭廷以即提議：

以中國政府與民間對於西方的理解、言論、研究、應付方策為主體。至於中外交涉之由來及其經過，則不在其範圍內。換言之，這是西力東來以後，國人對列強世界的觀念與對策之史料，有別於一般中外交涉事實之史料。⁴¹

一開始預計共編八輯，時間涵蓋自一八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編纂計畫十分宏大，胡秋原解釋道：

我們的工作有三。一是資料選錄之事。這包括蒐集材料、選擇材料、抄錄、標點、分段、更正原文錯誤，並註明來源。二是整理之事。我們不可像叢書體裁，變成資料堆棧，必須將這些資料整理得像一個百貨公司……三是參考資料之準備。這包括作者小傳以及選件之來源，大事年表，包括著作出版，及有關人物之生卒年代。此外，還應加上重要名詞索引及引用書目。⁴²

這項艱鉅的計畫在一九七二年的第一輯一、二分冊編完後，因近史所「工作重心漸由編纂轉趨研究」，⁴³所以此計畫即告中斷。到了一九八二年呂實強任近史所所長時，才決定接下這一重擔，並於一九九〇年完成了第二至五輯的編纂工作。最終成果就是近史所歷四任所長，為期三十一年編纂完成的《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

³⁹ 〈奕訢等奏洋務愈劇人少事多酌擬變通章程五條呈覽摺〉，同治三年八月二十日（1864.9.20）；《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中華版），第3冊，頁1215。

⁴⁰ 〈例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四國新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第1冊。

⁴¹ 〈第一輯序言〉，胡秋原，《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第一輯，第1分冊，頁1。

⁴² 〈第一輯序言〉，胡秋原，《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第1分冊，頁3。

⁴³ 〈第二輯序言〉，王萍，《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二輯，第1分冊，頁1。

彙編》（下稱《認識資料彙編》）。由於初期的構想過於宏大，所以結果並沒有如原先預期可以編到一九二七年，而是涵蓋一八二一到一九一一年。雖然缺乏北洋時期的史料，但《認識資料彙編》時間囊括九十年，足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相當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匯編。自一九五九年郭廷以倡議，至一九九〇年編纂工作結束，歷經三十一年，《認識資料彙編》方告大成，但是編輯時間延宕，主編更易，使得《認識資料彙編》不免有些許遺珠之憾。

就編纂體例而言，《認識資料彙編》中未載陽曆日期、索引條目不夠詳盡、人物小傳過於簡略；就檔案內容而言，因為郭廷以的構想和蔣廷黻不同，而比較類似費正清側重當時國人對西方的評論，所以編者對《三朝始末》的涉外文件比較不感興趣，因而外國照會，外人上書等文件都未收錄。例如兩份重要的文獻——赫德（Robert Hart）〈局外旁觀論〉及威妥瑪（Thomas Wades）〈新議略論〉兩說帖，均未蒐羅於《認識資料彙編》中。

上一節提到蔣廷黻編的《始末補遺》原以為不知所終。當蔣在大高殿查閱編輯原檔時，時為博士生的費正清陪同蔣氏一起工作。由於費正清研究的題目是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四年的條約體系（Treaty System），所以費氏與蔣廷黻作史料交換，只從《始末補遺》中挑選出 826 件原檔，抄錄一份帶回哈佛大學收藏。費正清返美之後，其抄錄的 826 件原檔就一直被保存在哈佛大學圖書館。而中研院近史所對此全無所知。郭廷以於一九六三年赴美進行研究訪問，時任駐美大使蔣廷黻才告知費正清可能還存有該批史料。郭於訪問哈佛大學時，一問之下，才知費正清所抄之 826 件原檔還見存於世。由於郭氏在一九三〇年代也曾隨同蔣廷黻至大高殿，深知該批史料的重要性，所以請費將這批檔案先寄給蔣過目，再轉寄至近史所整理出版。費正清回憶起這份檔案的來源，並在〈序言〉中道：

其時《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出版未久，清華圖書館並且收藏一批補遺文獻，抄自北平大高殿所藏軍機處檔案。為了研究緣故，我獲准從這些文件中選抄若干，後來帶回哈佛，收藏至今……我所保管的這份抄本，一向收藏在哈佛的懷德納（Widener）圖書館上我的研究室中，郭量宇（廷以）教授來遊哈佛，對之竟感興趣，真是使我欣喜。保管這批資料差不多有 27 年了。^④

近史所把該批 826 件手抄文件與《三朝始末》、《四國新檔》比對後，剔除重複檔案，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版，定名為《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以下稱《兩朝始末補遺》），共 708 件檔案，起於道光二十二年一月六日（1842.2.15）止於

④ 費正清，〈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頁 1-2。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2.1.23），約 50 萬字。可惜的是，蔣廷黻本來要寫序，但是已先於一九六五年十月過逝。

有趣的是，蔣廷黻早年的《始末補遺》稿本並未如郭廷以、費正清乃至於蔣廷黻本人以為的不知所終。存放於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始末補遺》稿本確實被日軍炸燬，但是另有副本一直被存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當《兩朝始末補遺》出版的二十三年後，北京大學則於一九八八年影印出版了九冊的《籌辦夷務始末補遺》，並在〈序言〉中略加比對近史所的《兩朝始末補遺》與《始末補遺》之異同：

《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稿本〉是在三十年代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教授主持下，輯錄故宮大高殿軍機處檔案而成書。體例一仍《籌辦夷務始末》，依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為序，編年紀月，一事一記，按事標目。記事上起道光元年（1821），下迄同治四年（1865），補《始末》之缺，詳《始末》之略，故名補遺……《補遺》較之《始末》有三個顯著優點：一、記事時限長。《始末》記事上起道光十六年（1836），而《補遺》記事始於道光元年，比《始末》多出十五年……二、輯錄原檔不遺餘力。清朝人輯錄《始末》時，對照會、函件多所缺錄，《補遺》則盡力搜索，不使遺漏，以確保外交史料的完整系統。三、輯錄檔案史料範圍更為廣泛。《補遺》一面沿習《始末》以中外關係為主線的原則，同時也增錄了相當多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史料，更加提高了使用價值。

美國學者費正清曾抄錄《補遺》的部份內容，在臺灣發表，現已編入臺灣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即為《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之原名）第六冊，精裝一冊（即為《兩朝始末補遺》），可惜的是，這部份史料僅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始至咸豐十一年（1861）止，割裂了史料的系統性，學者們無不引以為憾。⁴⁵

北京大學似乎沒有考證為何費正清只選抄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六一年的檔案，也不瞭解近史所如何大費周章地從美國取回費正清抄錄的 826 件原檔、比對其他史料後，再出版《兩朝始末補遺》。儘管如此，蔣廷黻在一九三五年編成的《始末補遺》於一九三七年以後不知所終，經過半個世紀後，在一九八八年重見天日，終是一件美事。但經由整理《三朝始末》而結緣的兩代中外史學工作者，竟無從得悉其來龍去脈。一九八八年蔣廷黻已過世二十三年，郭廷以也過世了十三年。費正清當時雖然尚在人世，但已為耄耋老者，可能也不知道這批史料已再度問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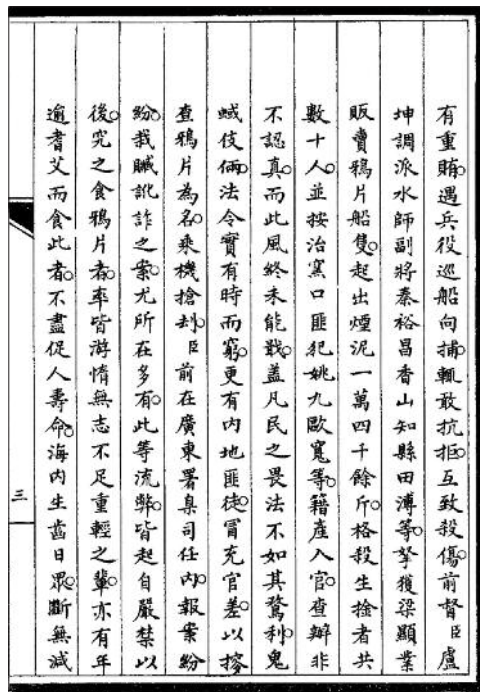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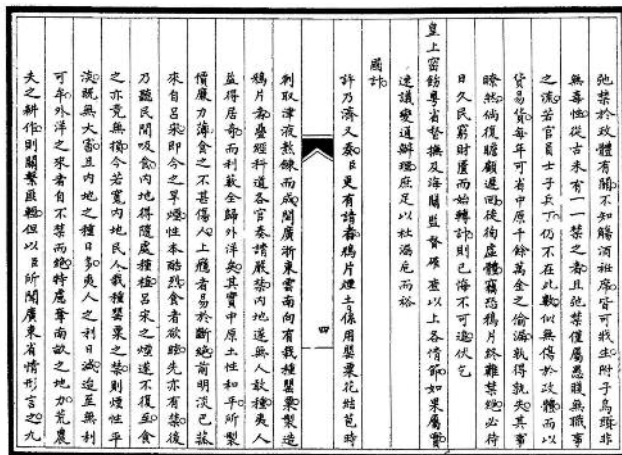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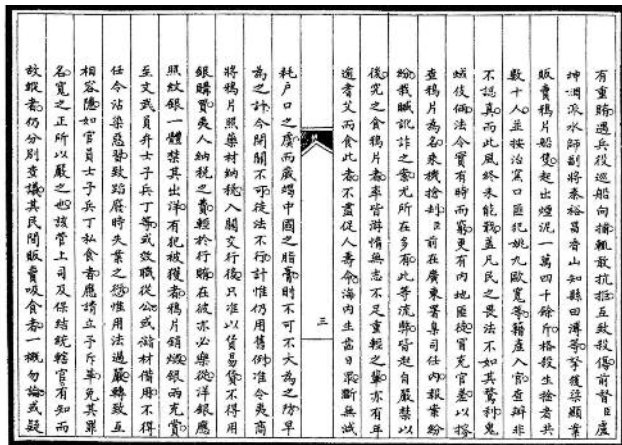
⁴⁵ 〈序〉，《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第 1 冊，頁 2-3。

四、現今流傳的《三朝始末》版本

雖然從十九世紀開始，不論清廷、中國還是美國史家皆注重《三朝始末》，但是這份中外交涉史料的編纂工作，直到二十一世紀才算整理完成。現今市面上流傳的《三朝始末》版本可概分為二：一為翻印自大高殿的原始影印版；二為重新排版後的印刷版。以下將這兩大類做一簡述（圖六～九）。

現今的影印版俱翻印自一九三〇年北平故宮博物院影印本，而不是蔣廷黻在王亮家中看到的抄本。市面上流傳四種影印版本：一、臺北國風出版社之「國風版」（1963，見圖六）；二、臺北文海出版社版之「文海版」（1971，見圖七）；三、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的「臺聯國風版」（1972）；四、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古籍版」（2008，見圖八）。「國風版」、「文海版」及「古籍版」俱無目錄、標題及索引；字體甚小，無新式標點符號（部份篇章僅有當年的隨文圈點及句讀）；使用干支記日，無相對應之陽曆，使用時極端不便。據圖六至圖八可知三版皆同，只是大小字體不同而已。

由此可見「國風版」在利用時最為不便，因為字體過小，影印模糊，但是國風出版社改組為臺聯國風出版社時，做了許多調整和整理的工作，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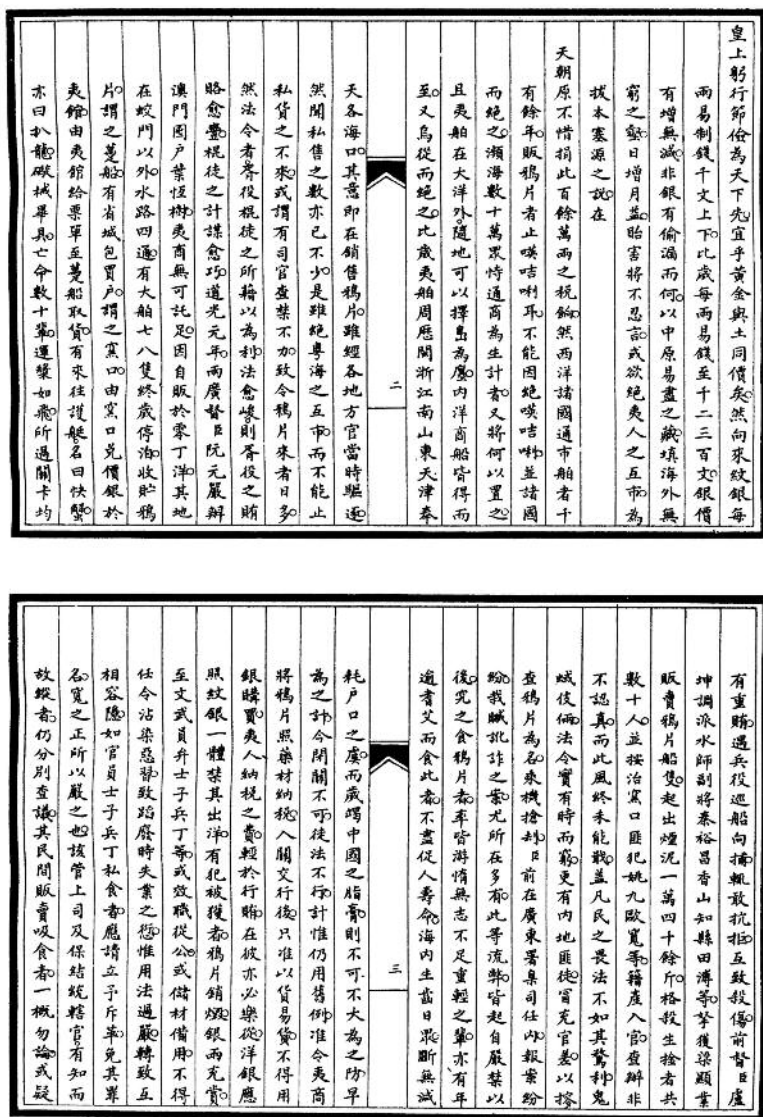


圖六：《三朝始末》國風出版社影印本（1963）

圖七：《三朝始末》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0-1971）

古今
論衡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圖八：《三朝始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8）

「臺聯國風版」（見圖九），該版的方便之處在於：一、把字體放大至「古籍版」大小（當時「古籍版」尚未出現）；二、做查出陽曆日期、目錄、及標題；三、並把史料做出分類，使得利用時相當方便，由於當時饒大衛的《始末索引》已經編纂完成，所以「臺聯國風版」並未做出索引。

排字印刷版則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的《籌辦夷務始末選輯》（1964）（以下稱《始末選輯》）和《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補編》（1967）（以下稱《始末選輯補編》）；⁴⁶以及大陸中華書局整理的《三朝始末》（以下稱「中華版」）。但是就規模宏大、影響深遠而言，臺灣銀行的整理工作是遠遠比不上中華書局。

⁴⁶ 《始末選輯補編》中挑選的史料，並非挑選自《三朝始末》，而是從近史所編纂的《兩朝始末補遺》與《四國新檔》中挑出，由本文可知，《兩朝始末補遺》及《四國新檔》中的檔案與《三朝始末》俱不重覆。請見，〈弁言〉，《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補編》（臺北：中華書局，1967），頁1。

籌辦夷務始末分類索引目錄

甲、道光朝部份

壹、鴉片戰爭

一、廣東

1. 弛禁鴉片

籌辦夷務始末分類索引目錄

甲、道光朝部份

壹、鴉片戰爭

一、廣東

1. 弛禁鴉片

編號

日

期

收

發

事

項

冊別

頁

次

道光十六年(丙申)四月廿七日(己卯)
(一八三六、六、一〇)

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

奏請弛禁鴉片使之以貿易貨以杜漏卮而裕國計

一

一一上

道光十六年四月廿九日(辛巳)
(一八三六、六、十二)

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

各省舊裁鹽業處如於稻作無妨擬聽民自便以絕夷人鴉片

一

一二下

道光十六年四月廿九日(辛巳)
(一八三六、六、十二)

上諭軍機大臣等

據許乃濟奏稱弛禁鴉片一摺著郭廷楨等妥議具奏

一

一三上

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二日(壬午)
(一八三六、一〇、一)

兩廣總督郭廷楨廣東巡撫郭境粵海關監督文祥奏

細核原奏均屬實情如弛禁鴉片詐擾之風不禁自絕擬請旨准原奏

一

一三上

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四日(甲寅)
(一八三六、一〇、一二)

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

弛禁鴉片之議原於是非者三關於利害者六萬不可墮其術中

一

一六下

道光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己酉)
(一八三八、一〇、二八)

上諭內閣

許乃濟奏請鴉片弛禁一摺冒昧瀆陳著降為六品頂戴以示懲儆

一

八一上

2. 互議貿易

道光十七年(丁酉)正月十八日(丙申)
(一八三七、二、廿二)

兩廣總督郭廷楨奏

英夷義律來粵管理商情事

一

一九上

道光十七年(丁酉)正月十八日(丙申)
(一八三七、二、二二)

上諭軍機大臣等

英夷義律來粵管理商務事著飭粵海關監督認真訪察

一

二十上

2. 互議貿易

古今

論衡

圖九：《三朝始末》「臺聯國風版」分類索引目錄

據圖一〇可見，《始末選輯》已加上新式標點，而且也註上陽曆年，並找出干支記日的陰曆對應之數字日期，利用時略為便利。但是該版本在編纂體例上仍有重大缺陷。由下圖可知，一、既然已加註陽曆年，又找出陰曆數字日期，為何不一併加註陽曆月日？二、目錄無題名，利用起來十分不便。但是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內容，因為編者僅挑出與臺灣有關的史料，所以在取捨之際，頗費考量，編者道：

凡直接關係臺灣之文件，當一概照錄，自無問題；所感為難者，厥惟一般事項而涉及臺灣之資料……鴉片戰爭中閩海籌防涉及臺灣者錄之，江寧條約簽訂後伊里布、耆英等摺奏有關英人索還戰俘者亦錄之。英法聯軍之役，法、美等國所提條款涉及臺灣開港問題，錄之……英、法、美、俄四國天津條約為臺灣開口通商之創始條約，全錄……總稅務司赫德所提稅務節略固僅略及臺灣，卻與全盤對外通商事務有關（臺灣自亦包括在內），錄之……⁴⁷

由此可知，以上述標準挑選後，必有遺珠之憾，欲研究十九世紀臺灣史，不可能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目錄	
卷一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	(一)
道光二十年四月	(五)
五月	(十)
七月	(四)
八月	(七)
九月	(九)
十月	(三)
十二月	(四)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	(七)
二月	(元)
閏三月	(三)
五月	(五)
七月	(吳)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卷一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十二月二十日（甲申），陝西道監察御史杜彥士奏：	
竊維治期協力，原無畛域之區分；而威震外夷，尤貴辦理之畫一。彼映咭喇夷船攜帶鴉片煙土在閩省海口銷售，已非一日；向來地方官一味隱忍，聽其逗留。現當廣東查辦喫緊之日，天威遠播，法在必行。閩省係接壤之區，有必當一體嚴辦、不可稍事姑容者。臣去秋八月因省親請假回籍，即聞漳、泉各處有夷船往來寄泊。本年二月間經過海口地方，見晉江永寧鄉有夷船四隻、深滬鄉有夷船三隻；其餘各處海口臣未能周歷，大約所在多有。其船堅大，八面受風；土人用千里鏡照之，見器械森列，槍礮俱備。屢經該水師提鎮到處察看，好言勸諭使去；奈夷情狡詐，將船開至偏僻地面，俟該提鎮回署，仍舊出來。至八月中，臣自原籍起程，尚聞各處夷船停泊如故；此夷船寄泊漳、泉海口之實在情形也。夷船所以停泊無忌者，由於水師員弁收受陋規，每船得洋銀四百圓、六百圓不等，船上煙土，皆管弁包庇販賣。如水師把總林和國包送鴉片、槍傷洋民，是其明證。更有一種奸民與營弁通同一氣，接濟水、米，多方獻媚，無所不為；每日包送妓女到船，恣其娛樂。如代理晉江縣知縣顧培於通夷犯婦吳勳娘被牽到案，不能根究逸犯施金等下落，經該督、撫奏參在案，該犯施金等尚未弋獲，亦其明證。現今沿海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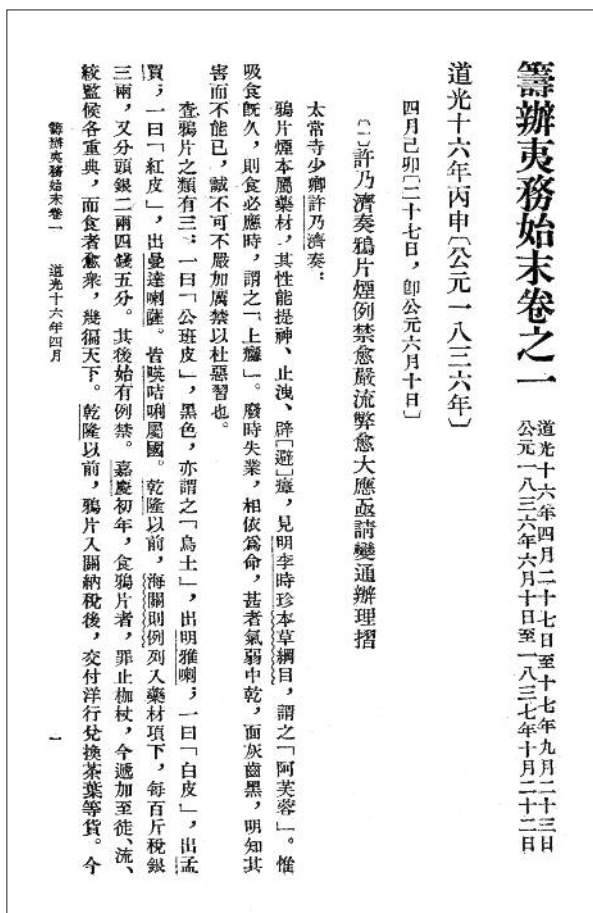
圖一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的《籌辦夷務始末選輯》目錄及內文

⁴⁷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臺北：中華書局，1964），頁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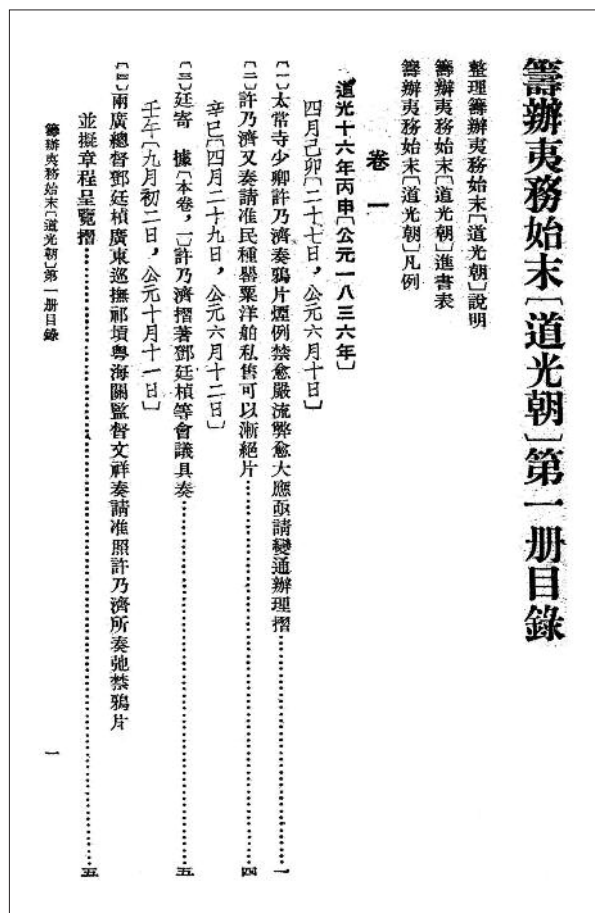
僅以上述標準搜尋臺灣史料，欲理解來龍去脈，仍需查找《三朝始末》中的大陸史料。如此一來，《始末選輯》形同雞肋，乃不常為史家利用。

大陸的排字印刷版《三朝始末》（見圖一一）為大陸中華書局整理（以下稱「中華版」）。除使用正體字及直行印刷外，就體例與利用度而言，比臺灣銀行所編之《始末選輯》大為改進。增加了新式標點符號、陽曆日期、各片文件題名，錯字校訂與增補，以及附簡單註釋，大幅提昇便利性。由於《籌辦夷務始末》太過龐大，中華書局於一九六四年完成道光朝的整理工作，一九七九年完成咸豐朝整理工作，再於二〇〇八年方完成同治朝的整理工作。唯一的缺憾就是「中華版」的索引，遠遠比不上饒大衛主編之《始末索引》來得詳盡。

所以影印版本的「國風版」、「文海版」及「古籍版」反而有一大好處為印刷版本所不及：因為饒大衛之《始末索引》之索引條目完全根據影印版之卷、頁、行數，所以欲使用該索引，就必須使用影印版本。就筆者親身利用的心得，欲閱讀《三朝始末》則選「中華版」，欲尋找某人事物條目，則使用《始末索引》再搭配影印版本為上策。



圖一一.2：《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版）內文



圖一一.1：《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版）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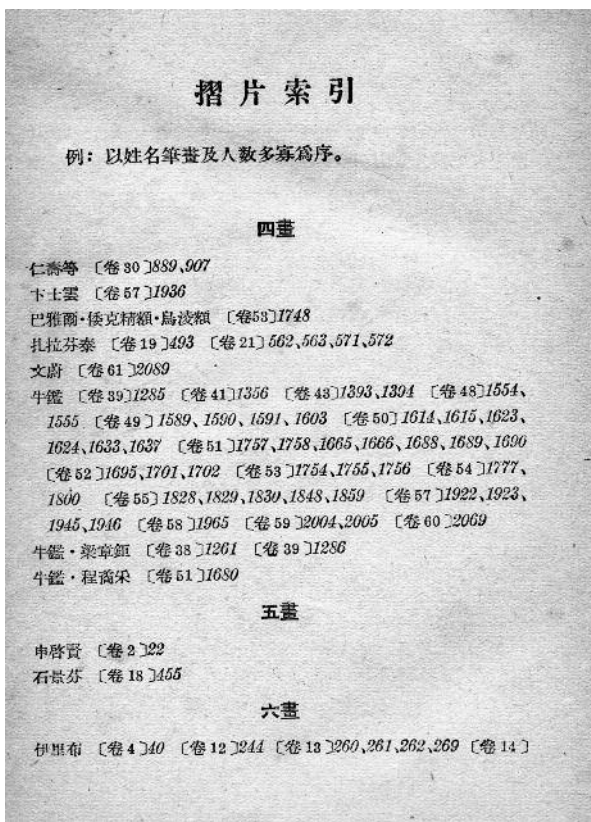
五、小結

《三朝始末》的編纂與流佈涉及三個世紀的中外史家，由大陸傳至美國，再從美國傳至臺灣。王彥威父子存抄一份，由蔣廷黻指導的費正清和洪業指導的饒大衛帶回美國後，再與中研院近史所合作，由郭廷以和楊紹震帶領了當年的研究助理完成一部分蔣廷黻和洪業兩人遺留下來的的工作，《三朝始末》的史料編纂工作也大大提升了這批研究助理的史料訓練和史學見識，未來也相繼變成近現代中國史學界中的佼佼者。

蔣廷黻獨具慧眼，深悉《三朝史料》足以與英國外交部藍皮書互相參照，是以一人之力在一九三〇年代就開始「利用」、「補遺」和「新編」《三朝始末》。雖然蔣在一九三五年離開了學術界，但費正清師從蔣時，領會《三朝始末》的重要性，師承其對晚清中外交涉之洞識，回到哈佛後帶領許多門生以《三朝始末》中的史料證據，對晚清現代化過程進行全盤探討，呈現中國政府持續現代化的努力，一反清末以來國人對清季政權全盤否定之看法。

不論是在中研院近史所，還是哈佛大學的近現代中國史家都非常重視《三朝始末》，但是其編纂完成到全文重新排版出版，竟歷經一百二十八年之久。《三朝始末》

雖然龐大，但是累月經年地延宕，畢竟令人費解。以下將這一百二十八年的歷程略加回顧：一八八〇年《同治朝始末》編輯告竣，《三朝始末》燦然大備，但是直至一九三〇年，《三朝始末》才開始影印為學界使用，中間相隔五十年；自一九三〇年學界開始利用《三朝始末》後，一九六〇年饒大衛才編纂出《始末索引》，中間再相隔三十年；又再過四十八年後，二〇〇八年「中華版」《同治朝始末》才編輯告竣，十九世紀編輯完成的史料，在二十世紀的大陸、美國和臺灣流傳，至二十一世紀才重新排版印刷出版完成，但是不論美國、臺灣還是大陸至今尚未建立起《三朝始末》之全文檢索電子資料庫。



圖一.3：《籌辦夷務始末》（中華版）索引

除了令人費解之外，令人感到無奈的就是，美國學者比臺灣學者對《三朝始末》更感興趣。如前文所述，其原因為：一九四九年後，美國政府鑑於二次大戰後共產中國的崛起，所以希望從根源瞭解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軌跡。雖然出自現實的考慮，但就學界研究的視野及規模而言，絕非中國政治人物之如豆目光可比。在美國官方主導下，近現代中國史研究力量逐漸成形，費正清一面以其指導的博士生為基礎，建立費正清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進一步又以其學生論文為藍本，成立哈佛東亞專著系列叢書（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在美國的官方支持、哈佛大學的學術環境、和費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團隊之天時、地利、人和的三重優勢下，美國的近現代中國史研究至今無國可與之比肩，一九五五年成立的費正清研究中心在西方世界獨領風騷數十年，而費正清在風雲際會下，變成近現代中國史學界的第一人。

當近現代中國史這一學門逐漸成形後，在某程度上，反而限制了近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因為美國只想要瞭解一九四九年後的共產中國，所以追溯一八四二年以前的中國史不符合其政治需要（這體現由政治目的發展出的學術終有其侷限性）。當臺灣和大陸學者一味追求與歐美學者對話時，就不由自主地進入歐美學者限制的時代區段中，導致了臺灣和大陸學者也把近現代中國史由中國歷史洪流中切割出去，近現代中國史與傳統中國史就此分家。為了解決這個弊病，蔣廷黻在《三朝始末》上用力之深，就是為了讓中國史家不致依賴英國外交部的藍皮書檔案，因為一旦依賴了藍皮書檔案，近現代中國史永遠都是在歐美學者中的語彙打轉。

由此可見，《三朝始末》對中國史學界何等重要！但是為何臺灣和大陸政府反而沒有美國政府的眼光，編纂《三朝始末》？其歷史原因可能就是藏在《三朝始末》的史料證據是國共兩黨無法承受之重。在國共兩黨的革命史觀和共產史觀下，清帝國和列強是共同的敵人。滿清貴族及其漢族官員「必須」是無能、昏庸、腐敗的集合體，不如此，無法合理化清末革命黨人於《民報》中的種族歧視言論，更無法合理化其在一九一一年前的軍事行動。對於列強，更有刻意扭曲的必要，不論歐美諸國內情如何複雜，彼此之間之中國政策如何歧異，只要損及中國利益，就一概以帝國主義侵略形容之，也不論中國是否有理虧在先，或是外國已一再嘗試使用外交手段解決無效後才訴諸武力。這就是立國正當性的問題，而《三朝始末》就是否定上述所有立國正當性的證據。

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早已淡去，立國正當性等問題已不再是史學研究的阻礙，但是曾與費正清編纂史料共事過的近史所研究員一一凋零後，早年近史所「南港學派」，強調以嚴整史料編輯為基礎的史學研究，已隨老一代學人花果凋零，不復為人所知。如此學術氛圍下，《光緒朝始末》之原件被遺忘在臺北故宮博物

院，乏人問津，也不足為奇。雖然在研究論文及專著的製作上，臺灣近現代史學界確實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是全神關注於研究，力求與國際同行比肩的結果，就可能落入當年蔣廷黻憂心的現象。

雖然國民黨的立國正當性不再是問題，但是臺灣近現代史學界的眼光漸趨單一則是另一問題，就從臺灣銀行編輯的《始末選輯》和《始末選輯補編》即可看出，臺灣近現代史學界開始全神貫注在僅與臺灣有關的史料。全神貫注是史學研究不可或缺的特質，但是就如《始末選輯》的編者一樣，斷然將《三朝始末》中與臺灣相關的史料切割出來，反而造成《始末選輯》不為史家所用的無奈事實。

一九四九以後大陸近現代中國史學界自有其學術脈絡，而其對史料整理之重視與貢獻，更是不容小覷，大陸中華書局在一九六四年編輯出「中華版」的《道光朝始末》，與應可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編纂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都可視為此史料整理脈絡中的項傑出成果。或許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緣故，「中華版」《咸豐朝始末》要隔十五年後到一九七九年才問世。或許也因為老成凋零的緣故，使得相隔近三十年，到二〇〇八年方編出「中華版」《同治朝始末》。雖然「中華版」燦然大備，但是也反映了中外學界不相通的問題，因為《中華版》索引的詞條數和設計之周延性，遠比不上饒大衛一九六〇年的《始末索引》。換句話說，可能中華書局的編者始自編輯《道光朝始末》時，大概不知道有《始末索引》的存在。日後既使知道，也未吸收其所長。類此現象，足堪嗟嘆。

雖然「中華版」已然問世，但是大陸學界仍在為共產史觀爭論不休，對於外國在中國的種種行為，還是無法心平氣和地客觀論證。一八五六年成書的《道光朝始末》開卷即道：「非徒詳往事之是非，實以資異時之考證」。這就是清廷編纂《三朝始末》的胸襟氣度，這影響了八十年後的蔣廷黻，以及一百年後的費正清，費正清回憶起蔣，認為他「從未鼓起對各帝國列強的盲目仇視，而這種仇視在國內我的一些同事中是相當明顯的。」⁴⁸

雖然在十九世紀中葉，清廷歷經兩次鴉片戰爭之禍，但是仍抱以「非徒詳往事之是非，實以資異時之考證」的態度；在一九三〇年代，蔣廷黻目睹英日兩國對華傾軋，仍承認當時中國人民理解的「帝國主義」，其「善惡利害還是有問題。」⁴⁹他們客觀而實事求是地呈現當時中外競合的來龍去脈，不就正在提醒今日舉手投足皆可使世界為之側目的中國大陸，不必在「異時」執著於「往事之是非」呢？

⁴⁸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p. 27. (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頁25)。

⁴⁹ 蔣廷黻，〈帝國主義於常識〉，《獨立評論》71 (1933.10.8)。引自蔣廷黻，《蔣廷黻選集》第3冊，頁420。

徵引書目

(一) 傳統文獻

文慶等纂，《籌辦夷務始末》，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景印民國十九年故宮博物院石印清內府寫本。

文慶等纂，《籌辦夷務始末》，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文慶、賈楨、寶鋆等纂，《籌辦夷務始末》，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

文慶、賈楨、寶鋆等纂，《籌辦夷務始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文慶等修，中華書局編，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京：中華書局，1964。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光緒間刻本影印，1998，第155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四國新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賈楨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同治六年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9。

寶鋆等修，中華書局編輯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

(二) 近人論著

王彥威、王亮編

1987 《清季外交史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何炳棣

2004 《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

胡秋原、王萍主編

1972-1990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朋園

1997 《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三井編

1995 《走過憂患的歲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陸惠勤等譯

- 1991 《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

張守常

- 1981 〈《籌辦夷務始末》、《洋務紀事本末》、《總理衙門清檔》〉，《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218-221。

馮明珠

- 1987 〈故宮博物院所藏「光緒朝籌辦夷務始末記」述介〉，《故宮學術季刊》5.2：85-106。

蔣廷黻

- 1932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週刊》37.9/10：997-1006。
 1933 〈帝國主義於常識〉，《獨立評論》71（1933.10.8），收錄於《蔣廷黻選集》，第3冊，頁420。
 1934 〈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清華學報》9.4：783-828，收錄於《蔣廷黻選集》，第3冊，頁519-568。
 1965 《蔣廷黻選集》，臺北：文星書店。
 1984 《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蔣廷黻編纂

- 1931 《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海：商務印書館，上卷；中卷，1934。
 1988 《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 1964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臺北：中華書局。
 1967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補編》，臺北：中華書局。

Evans, Paul

- 1988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Fairbank, John K.

- 1982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Rowe, David

- 1960 *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c1960.

Teng, Ssu-yü and Fairbank, John K. (with E-tu Zen Sun, Chaoying Fang and others)

- 1954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eng, Ssu-yü and Fairbank, John K. (with E-tu Zen Sun, Chaoying Fang and others)
1954 *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eng, Ssu-yü and Fairbank, John K.
1979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Mary
1957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